

二十世纪《史记》版本研究的回顾

张 兴 吉

在《史记》研究领域,对于《史记》版本的研究是基础且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内容。可以说,《史记》研究的进步是伴随着《史记》版本研究的进步而前进的。在整个二十世纪,学术界对于这一基础性课题,不断有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正是今日《史记》版本研究的新起点,因而对先前学者《史记》版本研究中的成就与不足,做一较全面的回顾,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在该领域的研究,从而也为新的一个世纪中,进一步开拓《史记》研究的新局面创造条件。基于此目的,本文力图对上个世纪的《史记》版本研究做一个较全面的介绍和总结。

一、二十世纪前的《史记》版本研究回顾

清代学术注重考据的风气,推动了版本目录学的进步。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开始注意书籍的版本。清代其他有名的书目如《爱日精庐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四库简明目录》、《万卷精华楼藏书志》等,都很注意介绍版本的存世情况。同时一些学者已经初步注意到《史记》版本的源流及体系,也有人注意各版本的关系。为后人研究《史记》版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素材。

清代刊刻的《史记》和明代比较,要少许多,但以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为代表的新版本,都在《史记》版本校勘上,投入了大量

的精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武英殿本《史记》一般被称为“殿本《史记》”,殿本《史记》影响很大,这不仅仅因其为官刻,而且是因为其校勘的精湛。就殿本的校勘而言,尽可能地用他本相互校勘,考证得失,确有开创之功。其校勘的力度是《史记》刊行史上前所未有的。殿本《史记》在清代就不断有人翻刻或影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殿本《史记》系统。

最能反映清代《史记》版本研究成就者,是清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由金陵书局刊刻的唐仁寿、张文虎校勘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此本号称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在校勘中,还吸收了清代学者的诸多《史记》研究成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钱大昕的《史记考异》中的成果,订正了其他本子的许多错误。当然,金陵书局本的“择善而从”,有时主观性比较强,妄改、误改也就在所难免,是以为后世学者所批评。然而就旧时代的条件而言,金陵书局本尽其所能广征诸本的做法,的确值得后人学习,所以此本的刊行堪称是《史记》刊刻中的一个新纪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陵书局本不同于在此之前出现的单集解本、二家注本、三家注本系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全新的版本。

在《史记》不断刊行的过程中,出于校勘的需要,人们提高了对《史记》版本的认识;进而对《史记》诸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求。清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系列《史记》校勘的专门性著作,如杭世骏的《史记考证》、钱泰吉的《史记校勘记》(见《嘉业堂藏书志》卷二,今存四卷,稿本)、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刘光蕡《校勘史记札记》等书,都致力于通过校勘,研究各版本文本的异同,以期形成一个《史记》善本。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初步地显露出了探究《史记》版本系统脉络的倾向。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打开,国内学界的视线也随之被逐步引向国外。此时国内学者也把搜寻散失在国外的中国古籍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学者编写了日本著名汉籍书

目《经籍访古志》,此书著录了后来为国内学者高度重视的南宋庆元年间刊黄善夫本和元至元二十五年刊彭寅翁崇道精舍本。此书的刊行并传入国内,为中国学者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此前后,国内学者开始有机会、有意识地接触国外《史记》版本,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

二、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史记》版本研究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承前代注重版本的余绪,学者已开始注意探求《史记》诸版本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材料的搜寻范围,较之前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史记》的版本研究也就成为《史记》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学科分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史记》研究资料的普及

自清末,石印技术传入中国之后,古籍的印数有了极大的进步。据笔者的调查,从1900年开始,翻刻、石印、排印的《史记》版本达40多种,宋、明、清几代有名的《史记》版本几乎都有再版;使《史记》研究资料得到普及。

和张文虎点校之金陵书局本《史记》的贡献一样,30年代有顾颉刚、徐文珊先生点校的《史记》。此书不仅因为是《史记》的第一个标点本而名垂青史,而且它更以其校勘成果,在《史记》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时期的《史记》版本研究,日本学者显示了很高的水平。表现在《史记》版本著录方面,新的版本不断被认识和利用。日本占领朝鲜时期,朝鲜总督府编印的《朝鲜图书解题》;日本东洋文库于1939年刊印的《东洋文库朝鲜本分类目录》,不仅著录了朝鲜刊刻的汉籍,还附有越南所刊汉籍目录;两书都记载《史记》版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先生著作《史记会注考证》,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汇集《史记》诸家注释的力作,同时也涉及了大量《史记》版本的内容。如他提到了日本公私机构所藏《史记》

古钞本14种,还提及了其他的日藏《史记》刻本,其范围基本包括了《史记》的主要版本。

神田喜一郎先生1938年编写《宫内厅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同年主编《敦煌秘籍留真》,后者收录了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三种《史记》集解本敦煌写本残卷。

在资料方面,日本各大学图书馆特别注意编撰馆藏“和汉书籍”书目,其中汉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书目,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日本各大学馆汉籍及《史记》版本的收藏情况,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另外,上面已经提到,二、三十年代日本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史记》古钞本,为《史记》版本研究准备了良好的资料条件。如寺冈龙含先生1936年著《史记三家注合刻创始时代考》^①,对《史记》三家注本的形成及各版本的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2.《史记》古本的发现

(1)古钞本及敦煌卷子的发现

将海外所存的一些有关《史记》古钞本等珍贵资料介绍给国内学界的工作,是从罗振玉先生开始的。清末到民国初年,罗振玉先生影印了他在日本所见的古钞本,其中有日本石山寺藏六朝钞本《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卷、“酈生陆贾列传”残卷;日本高山寺藏唐钞卷子本《史记集解》“殷本纪”一卷;日本神田文库藏《史记集解》“河渠书”残卷。这些藏于日本的古钞本被介绍到国内,丰富了国内《史记》研究的资料。

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日本学界由于当时某些特别的需要,曾出现过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高潮;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料收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史记》方面亦然。长泽规矩也先生在《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著录了多种日本在昭和年间影印的现存于日本的古钞本,如古典保存会昭和十年(1935)影印毛利氏所藏延久五年(853)钞本《史记集解》卷九,昭和十三年影印日本石山寺藏《史记集解》卷九十六后半、卷九十七(即与罗振玉所影印者

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昭和十年影印古梓堂所藏延久五年钞本《史记集解》卷十一;贵重古典刊行会昭和廿九年(1954)影印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延久五年钞本《史记集解》卷十。

1938年神田喜一郎先生编辑的《敦煌秘籍留真》,由小林写真制版所发行,此后台湾大学1947年又出版了他主编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其中有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唐钞卷子本《史记》残卷,包括《史记集解》“燕、赵世家”残卷、“管蔡世家”残卷、“伯夷列传”残卷。

诸多《史记》古钞本的刊行,使《史记》的古本资料被学界更广泛的了解,这无疑开拓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视野,是对《史记》研究的极大推动。

(2)北宋景祐本《史记》的发现

在清代,宋本古籍为学人所推崇,《史记》版本亦然。钱大昕、钱泰吉、张文虎等人都有用宋本《史记》进行校勘的活动。但所谓宋元秘籍,并非学人都有机缘亲身接触,比勘研究也就更加无从谈起。如现藏国图《史记》百卅卷存40卷本(清内阁大库旧藏本),在民国时期一直不为学界所知^②。是以从清代到民国时期,对于《史记》的最早版本,学界一直都有争议。民国时期,这一问题终于有了突破,傅增湘先生发现、收藏的景祐本《史记》被学界确认为《史记》最早的版本之一。1917年傅增湘先生以其过人的眼力,购此本于旧书肆,后又经沈曾植、曹元忠等先生研究,最后认定此本为北宋景祐本^③。这一结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注意,与傅增湘先生相熟的许多学者都得以亲眼见到这一珍稀版本。今人张玉春先生经过研究,认为此本可分为原刻、补刻,皆是北宋时所刊行。由此看来,此本的确是现存世《史记》版本中最早者之一。此本后来在1946年为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1957年台湾二十五史编刊馆收入仁寿本二十五史刊行,使学界公认最早的《史记》版本终于和广大学人见面;此举对《史记》版本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现藏于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的存69卷《史记集解》14行本,作为《史记》最早版本之一,国内学者也有接触。傅增湘先生曾两次接触此本^④。

(3)《史记》黄善夫本的发现

国内学者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对《史记》南宋黄善夫本有所耳闻,但因其全本藏于日本,接触过它的国内学者又鉴于其目录末叶有彭寅翁本的木记抄配,对这个本子曾有过多种推测。是以国内学者真正接触并了解此本,是在张元济先生将之列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影印之后。《史记》黄善夫本作为现存最早的三家注本,它的再发现,可以说改变了人们对《史记》三家注本版本体系,乃至整个《史记》版本体系的想法。《史记》黄善夫本的影印,虽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此本的影印,的确是张元济先生在《史记》版本方面的一大贡献。另外,张先生在利用黄善夫本的同时,还将黄善夫本和清代的殿本、明代的王延喆本进行了大量的校勘,从而得出了王本的祖本是黄善夫本的初步结论,这个结论极大地推动了史记版本研究的进步。

(4)元刊《史记》彭寅翁本的发现

在黄善夫本被发现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元刻《史记》彭寅翁本,并一度认为它是最早的三家注本。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学术界对彭寅翁本的存世以及版本内容还不能展开全面的研究,然而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国内学者也没有放弃努力。1949年以前,国内学者对彭寅翁本的著录以傅增湘先生成绩最大。他在三四十年代撰写的《藏园群书题记》中,对当时国内著名藏书家所藏的彭寅翁本逐一予以详细介绍,共著录了其所收藏、所见的五个彭寅翁本。这五部彭寅翁本《史记》的著录,基本上包括了今日存于国内的全部彭寅翁本。经过学者们的多方努力,学界对彭寅翁本的一些特点,已经有所了解,如其删节三家注的问题,已经为学界所熟知。

景祐本、黄善夫本、彭寅翁本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史记》版

本研究的基础资料。而后两种版本的再现,将《史记》三家注本出现的年代,从明代提前到宋代,使初步地勾勒《史记》三家注本形成的大致轮廓成为可能,为后人研究《史记》的版本源流创造了条件。

3.《史记》版本理论研究的突破

(1)研究视野的扩大

古本的再现使国内学者意识到,《史记》版本的流动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经籍访古志》等著作的引进,则使人们注意到国外所藏《史记》版本的问题,特别是日本藏《史记》版本的问题。1936年顾颉刚先生、徐文珊先生合作刊行了《史记白文之部》,顾颉刚先生在序中说:“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问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尤使予等奋发自励。”徐文珊先生在序中也说:“日本方面收藏我国古本《史记》甚多,钞本、刊本都有;如能与彼邦人士合作,自是大快事。即使不然,就彼邦已校已刊各本与中国各本合校,收获亦必可观。”1939年至1949年间王重民先生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提要》,其中对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史记》版本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国内学者对国外《史记》的研究都有相当的了解,对与国外学界的合作,也表现出极大的渴望。就其视野而言,已经比前人更加开阔。

(2)理论体系趋于完备

随着中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历史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史记》的版本研究也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一些学者已经从一般的著录发展到全面探求《史记》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力求建立一个完整的《史记》版本体系。

有两部杰出的论文,即王重民先生的《史记板本和参考书》和赵澄先生的《史记板本考》,分别发表于1926年12月和1931年8月。这两部论文已经初步摆脱了旧时“图书经眼录”的形式,采用新方法研究史记的版本,即通过诸版本的比较,力图寻找诸版本之间的关系及演变的规律。这两篇论文的出现可以说开创了《史记》版本

研究的新时代。

王重民先生《史记板本和参考书》中,对宋以下的版本逐一著录,并比较异同。此文将各版本的比较,及其演变放在重要位置,并制成一表,来反映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其文曰:“兹将诸版本之递相翻刻,仿世表法列一表;以与文内所述相参证焉。”

赵澄先生在《史记板本考》中对《史记》诸版本及其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虽然赵澄先生此文受当时资料的局限,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他的两个主要贡献表现在:其一,引用《经籍访古志》的资料,将《史记》彭寅翁本定名为“世初至元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刊本”;其二,力求用图表方式,通过比较各本文本、版式的变化,梳理《史记》的版本体系。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书目都比较注意版本问题,如《书目答问补正》等也介绍了《史记》的一些版本。

三、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史记》版本研究

1. 国内学者的研究

版本方面,稀见古本的不断影印再版和大量普及本的出现,为《史记》版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史记会注考证》,又影印南宋绍兴间刊《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本。而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出版,则是《史记》版本研究的最大成绩。这个集中了当时国内一流学者点校整理成果的本子,以清代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又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可以说是《史记》的一个全新版本。因此,它问世之后,遂成海内外发行量最大、最通行、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版本。

这一时期为进一步深入对《史记》的研究,学界与出版界合作,重印了许多《史记》的重要版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包括了彭寅翁本《史记》,该本是据国图藏彭寅翁本《史记》百三十卷本(配中统二年本6卷)影印;可惜此本不是全

本,而且原底本多有残破,是以影响到学界的使用。199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底本选用万历年间刊刻的李光缙增补本,并以日本明治卅二年翻刻本校勘。2002年4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由线装书局影印出版,其第一辑中有元刊本三家注《史记》彭寅翁本,此本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枫山文库本影印,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本彭寅翁本。另据网络中的消息:2001年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与三秦出版社合作影印明嘉靖九年张邦奇、江汝璧所刻南监本《史记》。不过,上述两个版本皆以线装书的形式出现,价格不菲,故于一般学者及研究人员而言,依然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

《史记》各版本的不断再版,是《史记》版本研究进步的标志,也是其进一步深入的条件。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冠以《史记》名义出版的《史记》(指包括《史记》全文者,个别书删去《表》部分)达到了70种以上。这其中从印刷方式上说,包括了影印本、排印本;从体例上说,包括了白文本、三家注本、全新注释本,还有白话全译本、文白对照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书的前言中,其中一部分整理者或出版者表明了所据底本的情况,如1997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史记》(全2册)130卷,郭逸、郭曼标点,前言中说明,此书的底本是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即黄善夫本的影印本。1997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梁昭辉标点《史记》,说明此本以清乾隆年间武英殿本为底本标点。这都表明了人们对《史记》版本的重视及版本意识的提高。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史记》出版的目的是为了普及,对《史记》正文及三家注都有一定的删节,特别是在这些普及本中,大多数版本删节了《史记》中的《表》。

此时期《史记》版本研究的成就还表现在书目、索引类图书的出版方面。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出版了一些大型古籍善本书目,如1957年上海图书馆编写的《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年

由赵万里、冀淑英先生主持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为史记版本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之相呼应的，1957年《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的出版，第一次详尽地著录了《史记》的各个版本，开创了《史记》版本研究的新纪元。此后，参与《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的编写、并主要负责版本部分撰写任务的贺次君先生，在1958年出版了《史记书录》一书。此书开列了64种《史记》版本，几乎包括了现存的《史记》所有主要版本；对各版本的命名及关系，各本的形成、版式及其在《史记》版本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有全面的探讨，是一部至今为止研究《史记》版本的最重要的工具书。其成就之巨大，至今无能替代者。

在贺次君先生的《史记书录》出版之后不久，“文革”开始，中国国内的《史记》版本研究继而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几乎没有进展。

在上述书目、索引类图书中，都扩大了《史记》的版本著录范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主流书目在著录《史记》版本时，都注意到对国内外的《史记》的存世情况及收藏地点的介绍；二是各主流书目对《史记》版本的具体内容有了新的认识，即对《史记》各版本的版本形态，有些还对行格情况都加以说明，并兼及版本的流传过程。

1976年台湾学者王民信先生编撰的《史记研究之资料与论文索引》一书，此书在吸收了《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国外《史记》版本收藏情况的内容，扩大了《史记》版本的搜寻范围。此书的不足在于因袭了《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的一些错误。

1967年初版、1986年增订二版的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对藏于该馆的《史记》版本有详细的著录。1982年台湾出版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中有一些《史记》稀有版本的图版，使一般学者得以窥见稀见善本的面目。

1989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燕起、俞樟华先生编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一书。此书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有关《史记》研究著作的一个全面总结，它吸收了五十年代《史记研究的资料 and 论文索引》的著录成果，并加入了《史记研究之资料与论文索引》的相关内容，其中对《史记》版本的著录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此书的不足在于，它几乎全文照录了《史记研究的资料 and 论文索引》中版本的著录，并加入了《史记研究之资料与论文索引》的内容，但对上述两书的错误并没有给予全面的纠正，反而因袭了其中的许多错误。

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对现存在中国大陆的《史记》诸版本进行了比较全面、准确的著录，特别是此书对现存于大陆的《史记》诸版本的收藏情况有明确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数十年来国内学者《史记》版本研究成果的一个全面的体现。

在八十年代之后，作为编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前期准备，国内各地对现存古籍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各地出版了一系列的古籍善本书目，其中对《史记》的版本都有一定的介绍。而相对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更侧重于“珍本、善本”，各地所编的古籍善本书目中，对古籍的“普通本”有较详的著录，这无疑扩大了《史记》版本的介绍。随着各地和各大学对自藏古籍的调查，一些不多见的《史记》版本也被发现。如《泰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84年油印本中，著录有明万历初广州刊《史记》张守约刊本，此本仅在傅增湘先生的《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有简要介绍，而此后各书目对之皆未著录。又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著录有明刻《史记》黄嘉惠本，此本也不多见。由此可见，地方古籍书目的编撰对《史记》版本的挖掘有极大的意义。此外，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国内各地、各大学图书馆大多开设了网上书目查询业务，其中有相当多的

图书馆可以查询到《史记》的版本。诸多技术的进步不仅帮助展示《史记》版本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将推动《史记》版本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此时期的《史记》版本研究进入了成果收获期;突出的成果是对于《史记》版本系统的描述,终于有了比较可信的结论。而此种结论与前代学者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仅凭前人的著录来推测《史记》的版本系统,而是建立在《史记》诸版本的文本校勘、版式比较等基础上的综合研究,因而其结论的科学性,较之前人,是不言而喻的。

1986年吴汝煜先生《史记论稿》“附录”中有“《史记》的流传及注本”和“《史记》版本略述”二文,对《史记》的版本有一定的介绍。据吴汝煜说:“《史记》的流传及注本”一文参考了陈直先生“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一文。而“《史记》版本略述”的内容则多采自贺次君先生《史记书录》。的确,此文没有太多超越贺先生《史记书录》之处,基本因循旧说。

1987年易孟醇先生《史记版本考索》一文中,对《史记》版本也有介绍。但此文的重点不在说明《史记》版本的存世情况和源流,所以其对《史记》版本的介绍,同上文一样,多是因循旧说,而且大多语焉不详。如此书中在介绍元代刻本时,仅用一句“元代《史记》刻本,国内现存尚有约十部”概括;而对三家注本的彭寅翁本,只说有“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的三家注合刊本残卷”,完全是拘泥于贺先生《史记书录》的旧说。

同年安平秋先生发表的《〈史记〉版本述要》是五十年代贺次君先生《史记书录》之后的又一力作。此文的特点是继承了贺次君先生《史记书录》的优点,对诸版本的形态,特别是版式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此文是安先生多年以来躬身考察以及搜寻《史记》版本的成果,结论翔实可信。另外此文对《史记书录》中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的订正;也指出了许多贺次君先生没有注意到或忽略的版本,如指出

明刻《史记》吴勉学本的改修版——黄之案本的存世及基本情况。此文的最大价值在于在《史记》版本研究中，首次用分类的方式，对诸多版本加以说明。如将现存的17种“宋代以前的钞本”分为四类；把宋代以后的版本分为《史记集解》单刻本、《史记索隐》单刻本、《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白文无注本、百衲本、评林本、“五四”以来的版本等八大项，而后在每一大项之下，再加以细分，如对宋代的七种集解单刻本又分为十行本、十四行本、十二行本、九行本四类；之后再对每一个具体的版本加以细致的介绍。这样的分类，除了“‘五四’以来的版本”和“百衲本”两项与版本版式无关外，其他都是从文本、版式上来区分。特别是提出《史记集解》单刻本、《史记索隐》单刻本、《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这四类《史记》版本的主流版式版本的方法，是一个极为简明清晰的分类方法。这对于从版本的版式上体现版本的种类和源流极为有利，从而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也便于一般的研究者利用和了解《史记》的版本分布情况。此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因八十年代初期国内学者与海外学界交流不畅，无法更多地吸收海外《史记》版本研究的先进成果。

2001年张玉春先生《〈史记〉版本研究》的出版是二十世纪《史记》版本研究的极大亮点^⑤。此书实际上是作者在安平秋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是在《〈史记〉版本述要》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此书在《史记》版本研究史上，第一次对《史记》的六朝写本到明代刻本的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第一次在针对《史记》版本各原本的研究中，在全面进行版本比勘的基础上，以大量的实证，对《史记》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初步得出了《史记》各版本体系之间关系的结论。其成果是空前的。不过，此书亦有一些小的疏漏，如在著录彭寅翁本时，忽略了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两部，仅介绍了国内现存的三部和日本所藏的四部；另外，此书对明

代以后出现的《史记》版本涉及不多,研究范围稍嫌不足。

2. 国外学者的研究

版本方面,1995-1998年日本汲古书院据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南宋刊《史记》黄善夫本,全本影印出版,无疑是对《史记》版本研究的极大推动。因为20世纪30年代张元济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虽然也号称据黄善夫本影印,但其间因对原本改动极多,已经失去黄善夫本的原貌,这已是学界一致认同的事实。日本的此影印本可以说完全忠实于原本,从而使《史记》版本研究者可以真正一睹黄善夫本的原貌,以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本的错误认识。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于《史记》版本的著录依然引人注目。长泽规矩也先生1959年编写了《日本翻刻本汉籍目录长编》,以油印本问世。后来又加以补充而正式刊行,名为《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稿》,于1977年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长泽规矩也先生在《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对日本自庆长年间到昭和年间的翻刻版、活字版、影印版的各种《史记》版本作了详细著录。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中国学再起高潮,推动了日本学者对《史记》及其版本的研究。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学者较之中国学者的研究要领先一步。日本学者阿部隆一先生1976年发表了《中国访书志》,1983年在其去世的当年,此书又发行了增订版。在此书中,他对台湾主要藏书机构所藏《史记》的宋元刊本和日本的《史记》古钞本、古刊本的版本形态都有详细的记述;使我们了解到台湾藏《史记》版本的真实情况。

继阿部隆一先生之后,在宋元版《史记》的著录及版本形态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者是日本学者尾崎康先生。他在《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1月发行)中对传世的宋元版《史记》有详细的著录,其中对彭寅翁本的著录是到目前为止最全的,记载有彭本现存世刻本中的9个版本。可惜,他只进行了《史记》宋元版的研究,

而且他的研究,偏重于著录和介绍《史记》诸版本的版本形态,于《史记》的版本体系涉及不多。

此一时期除了日本学者之外,海外学者对《史记》版本的著录也值得我们的注意。沈津先生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对现藏于该图书馆的《史记》版本有比较详细的著录,同时他还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丰富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如《史记题评》一百三十卷明杨慎、李元阳辑,高世魁校,嘉靖十六年(1537)胡有恒、胡瑞刊本,一般的书目皆题为“胡有恒、胡瑞敦刊本”,沈津先生利用地方志,证实前人在此问题上有误,“敦”系误读。沈津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笔者查此本的书影,发现在此本的全卷末,有题记云“嘉靖十六年丁酉福州知府胡有恒同知胡瑞敦雕”。此二人的名字皆作小字(又“恒”字缺笔),表明二人的姓名为“胡有恒”、“胡瑞”无疑。

此外,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于1956年印行了《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韩国学者1981年12月出版了《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此书1994年修订再版,其中著录了韩国刊行的两部刻本《史记评林》,两种活字版《史记评林》。而在此前的《史记》版本研究著作中,也有过对韩国刊行汉籍(即韩国本、或称朝鲜本)的记载,但多语焉不详,令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窥见韩国本的真面目。

历代日本学者对《史记》版本的研究,的确推动了《史记》研究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水泽利忠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乃是集其大成者。我认为: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实际上是一部完全独立于《史记会注考证》的《史记》研究著作。其最大的成绩在于对日本所藏《史记》诸版本进行了大型的比勘,就其性质而言,《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是一部反映现存世主要《史记》版本中文本异同的重要著作,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一件巨大而有益的工作,从而为《史记》版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宽泛的基础研究资料。

在《史记》版本比勘方面,水泽利忠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各册所附图版及第八册中的长文“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中著录、介绍了大量的《史记》版本,尤其是日本所藏的版本。此外,他对《史记》宋元刻本和日本古代抄本、刊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达到了前人从未企及的高度。

水泽利忠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确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可惜,至今利用此书的学者并不多。的确,此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论著,实际上它更像是一部大型索引工具书。虽则如此,就此书的实用性来说,至今为止,《史记》研究界还没有一个人,如水泽利忠先生那样对《史记》的各主要版本做近乎逐字逐句的对勘,此书所列出的诸版本异同,为后人提供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书名,使他的成就淹没在《史记会注考证》的光环之下,在人们的印象中,《校补》只是《考证》的补遗之作,而没有注意到其真正的价值所在,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在中国“文革”期间,日本的《史记》版本研究还在持续发展。日本学者池田英雄先生指出:“建立在江户、明治悠久传统之上,日本的版本和解题研究顺畅地进行,并不断地向深处延伸。”^⑥在此期间,《史记会注考证》出版了修订版,《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也出版了第九卷,两部巨著都通过一些修订,纠正了初版的错误,对《史记》的一些版本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四、《史记》版本研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1.《史记》版本系统的进一步研究

在前面已经提到,到《史记版本研究》一书的出版为一个阶段,学界历经数代人的努力,对《史记》版本系统的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大框架的《史记》版本系统已经成型。接下来的任务是对更加细微的版本系统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相对于宋元版,对明版及

明以后的版本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对明监本《史记》的来源及其四个本子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不深入;近年来虽有张玉春先生的《史记版本研究》涉及于此^⑦,然而,其说仍有些问题。笔者将以专文辨正之。其次,国内学者对明代《史记评林》本的研究存在着严重不足,只有贺次君先生在《史记书录》中,提出过《史记评林》来源于明嘉靖三刻之一的柯维熊本的观点。此后中国学者对这个观点,也没有进一步的讨论。再次,对清代武英殿本及其后续版本的研究亦有待强化,包括对武英殿本来源的探究、通过校勘了解其校改底本的情况等工作仍未见进行。

2.关于《史记》三家注的研究

我们知道,今日我们看到的《史记》三家注在“三家注本”出现之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换言之,如果比较今日“三家注本”中的“三家注”和原本单独成篇时的“三家注”,我们就会注意到,两者之间无论是在体例,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仅是一般古籍文献流传中会出现的“异文”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学术思想的变化及中国古代印刷术变迁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史记》三家注的形成及其衍变作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恢复原三家注各自的原貌,从而实现古籍整理“存真”的目的。当然复原三家注的原貌,也不是我们的最后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发掘三家注通过每一个版本所反映出的每一步变化过程,来探索古人注释文献的方法和思想,从而揭示中国古代学术及其思想与文献研究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强化对《史记正义》及其佚文问题的研究,澄清《史记正义》佚文的来源。笔者认为此类研究的关键点在于《史记正义》佚文地的载体——日本所藏《史记》诸版本中日本学者批注,通过对包含《正义》及不包含《正义》的批注作全面的研究,对不同版本中批注的对比考察,对相同内容的批注之间关系的探讨,方有可能解决日本学者批注的种类、目的及资料来源等问题,澄清《史记正义》佚

文之谜。

再次是深入对《索隐》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对《史记索隐》的进一步研究应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进一步深入探究《史记》单索隐本的来源;其二是注意《史记》二家注和三家注中的《索隐》变化,对历代《史记》校勘者、刊行者在“索隐”的取舍中所表现的体例及原则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从而准确了解三家注的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

3.对海外版《史记》的调查及其流布的研究

《史记》曾在海外刊刻出版过。如前面已经提到,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海外刊本是永乐二十年朝鲜刻本;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学界针对朝鲜刊行的《史记》版本作专题性研究。在日本,不仅《史记评林》有大量的翻刻,有14个版本之多;而且在日本十六世纪末以后还出现了三种三家注本活字本,十九世纪还翻刻过《史记》黄善夫本的一些篇卷,如日本嘉永二年(1849)丹波元坚存诚药室影刻黄善夫本《扁鹊仓公列传》一卷,并附堀川济撰写的《影宋本扁鹊仓公列传考异》一卷、《扁鹊传备考》一卷一起发行。此外日本还有翻刻《史记论文》及《史记》的一些选本。因此笔者认为,进一步强化对日、韩为代表的海外刊《史记》版本的研究,不仅是不断开拓《史记》版本著录范围的需要,也是进而吸收海外《史记》研究成果的必然,因之此项研究应是《史记》版本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注:

① 池田英雄:《史记学50年——日中“史记”研究の动向》,明德印刷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② 兴吉案:此本贺次君先生认为是北宋景祐年间刊行;张玉春先生认为是北宋景祐本在南宋初的覆刻本。

③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页,又见《增订中国访书志》第626页,《藏园群书经眼录》第160页。

(下转第 174 页)

四字。《双鉴楼善本书目》卷三记录了这个本子,称为“高丽旧刊本”。

祝穆在《事文类聚》编成的时候,对于这部书是否会“终泯于覆瓿”不无忧虑。今天简略地回顾《事文类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被一再续编,一再翻刻,且远播海外,流传七百余年到今天的过程,可以知道书的内容是切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在古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在保存古代文献,传播中华文化中,都发挥了其自身的作用。今天,《事文类聚》作为传统文化一个侧面的缩影,还在吸引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不断地研究,它是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上接第 69 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⑤兴吉案:张玉春先生此书虽然出版于20世纪结束之后,而在2000年以前此书的一部分内容已经作为单篇论文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⑥《史记学50年——日中“史记”研究の动向》,第137页。

⑦说详《史记版本研究》第334页。

作者工作单位:海南师范学院政法系